

## 宋元时舟山有个“大金塘”

——昌国千年古村吞地名里的故事

□王自夫



## 四十三吞隐藏千年秘密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1298)乡村篇中隐藏着这个秘密。文中记有当年舟山总共四个乡所属都、里、村、吞的名称。四个乡中，居舟山岛大部的富都乡最大，“占东北总九都，里二，村二，吞八十三”；合今嵎泗及岱山大部的蓬莱乡“占东北总五都(今并为三)，里一，村三，吞六十九”；安期乡则以今普陀区境内众多小岛为主，“占东南总三都”，里一，村三，吞四十七。

金塘乡“占西南总四都；里一，湖上里；村二，大吞村在西，烈港村在南，吞四十三”。这四十三吞具体地名，需要细细品读。

“吞四十三：五百吞，雷峙，上周，上林，黄将吞，三家村，里吞，大吞，塔头，夏家吞，上千，泗洲吞，东墩，西墩，小里，蛤蜊吞，烈港，岑江，宣家吞，涨史，扶桑，盘吞，大沙，小沙外吞，青吞，长白，马墓，宜山，孤史，册子(岑江背)，秀山，秀枝，双鸭，章门，石屋，厉吞，长涂，跋吞，深水，灌门，许家吞，稠江，册子(海西)。”

这些吞名总体可辨可信。许多延续至今，如东墩，西墩，大沙，长白，秀山等；一些有变动的也易辨别，如烈港，岑江，涨史，孤史(涨史即涨次；孤史，即富翅，又名菰茨)；还有一些模糊不清，依靠多方考证查明前身，如宜山为今鱼山，厉吞为今大长涂山。吞名排列总体有序，大多与实际地理组合相近。比如金塘乡吞名排列，明显靠前的多是金塘岛上居民点，再是在舟山岛西北部，然后是舟山与岱山岛海域之间诸岛。当然，也有个别吞名似放错了位置，还需要仔细甄别。

四十三吞，就是四十三居民点。借助古村吞地名，可画成一张“大金塘”地图。它除了金塘岛外，还包括今天的册子、岑港、小沙、秀山、长涂等乡镇(街道)以及岱山的鱼山等。如果更仔细查看相邻的富都、蓬莱两乡吞名，辨明三乡边界四址分隔，还会有新的惊喜发现。

## 两个灌门和两个册子之辨

四十三吞中，有个“灌门”，排列在厉吞、长涂吞名之后，似不在舟山岛西北部陆域。清代学者朱绪曾著《昌国典故》一书，称灌门在干礁，元代属金塘乡。干礁与秀山之间海域确有灌门，是个海上重要航门，《昌国州图志》称“或者为蛟龙之窟穴云”。但干礁吞属富都乡，并且它与金塘乡小沙吞之间还隔着马吞一大块地方，而马吞仅出现于富都乡吞名中。金塘乡吞名中只有“马墓”，没有马吞。这样，如果灌门属金塘乡，两者无法陆地相连，似乎不合情理。

笔者认为，“灌门”是指陆上居民点，不是海中“蛟龙窟”，前者得名大概率源于后者。但海陆两个“灌门”应相近，都在干礁旁，而不会在长涂附近，应是被古籍放错了位置。至于富都乡马吞，它在吞名中排列在大蒲吞、小蒲吞之后，芦花、沈家门之前，明显在今普陀区境内，此马吞不是今马吞概率更大。笔者以为，小沙与干礁之间有个为金塘乡所属的村吞，这才是马吞真实位置。灌门吞在马吞之东，干礁之西，这里是金塘与富都两乡北边临海界址。

四十三吞中，还有两个册子吞，一个在“岑江背”，一个在“海西”。前一个指岑港附近的册子岛，那么，“册子(海西)”又在哪里？这里的关键是找到册子这个地方。好在《昌国州图志》提供一个线索：“金塘乡之海西”有座翠萝寺，五代吴越王送过铜钟、铁塔，宋代很有名气。《岱山县志》(1994年版)说，“海西”在岱山双合山，翠萝寺、册子都在此地。双合山又称两头洞，为岱山岛西侧一小岛，1980年仇江门促淤大坝竣工，才与岱山岛相连。

2014年时，林斌先生考证认为，双合山大小，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支撑翠萝寺香火绵延，“海西”应指西岱山。原来，宋元时岱山岛分为东岱山和西岱山，中有宽阔水道直通北海洋。他认为，东岱山曾建岱山镇，经济尤为繁荣，水道就像内海，航运便捷，人们就把水道以西的西岱山俗称为“海西”，这里才能找到古翠萝寺和册子岛。他还认为，金塘乡古吞中，“双鸭”即今双合，“稠江”即今仇江门。

笔者注意到，南宋《乾道四明图经》(1169)记昌国诸山有：册子山“在县西北二百五十里”，西岱山“在县西北二百四十里”，东岱山“在县西北二百五十里”，其地理方位可以印证册子就在岱山岛附近。但关键词“海西”，究竟这个“海”在何处难以定论。“海西”西岱山说，从古代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角度辨析，比“海西”双合山说更具说服力，应可成立。

东岱山和西岱山中间那个水道后来逐渐变狭变浅，自北浦(今东沙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长十几公里，清代时仍可通航，最终连成一体。从水道流向线路来看，东岱山远比西岱山大，但“大金塘”居然还拥有今岱山岛不小的一角，这已经出乎人们意料。

“大金塘”，它可分为南北两大块，南边一块是金塘、册子及舟山岛西北部岑港、大沙、小沙、马吞等地，使人联想起要建的甬舟铁路图；北边一块，上有鱼山、西岱山，下有舟山与岱山海域之间从西到东一连串岛屿，从长白到秀山、长涂诸岛，可能一直到中街山列岛，有如一幅海上舞龙图(见右上图)。

## 鄞县与定海县曾分治舟山岛

那么，南宋时金塘乡也是这一模样吗？再上溯历史，北宋、五代、唐代，也有这么一个形状的金塘乡吗？

查南宋古籍，《宝庆四明志》(1229)昌国县乡村篇，没有记录舟山有多少吞，叫什么名。但所记的乡、村、都、里，与《昌国州图志》大致相同，就是多了一个岱山镇。宋代社会经济远胜蒙元。《昌国州图志》还说，蓬莱乡原来有五个都，“今并为

宋元昌国四乡略图  
王自夫 试作

三”，加上岱山镇的消逝，这都在暗示元代舟山不如南宋繁荣，村吞，南宋居民点不会比元初少。元初金塘乡大体继承南宋时的基本格局，有理由相信，四十三吞吞名就是从南宋流传下来。因此，至少到南宋中期，“大金塘”已经成形。

不过，“大金塘”是相对以后的金塘乡而言为大。由于地广人稀(元初舟山总人口约13万人)，古代的乡有时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地域，而“都”的面积往往就有一个乡那么大。元代的金塘乡，如果真的限于金塘岛一隅之地，那就该叫做金塘“都”。

“都”为当时乡村承担朝廷赋税徭役的基础单位。舟山每个“都”下面的吞平均为十个左右。《昌国州图志》记载，“本州需岁纳鱼鲙八十斤，于出产都分科征，始于元至三十年。金一都一十斤，金二都一十斤，金三都二十斤，金四都二十斤，蓬三、四都二十斤”。鱼鲙即鱼脍，金塘乡四个“都”以产鱼鲙出名，得分担科征义务，向所有村吞百姓去收取。

金塘成为舟山一员要比其它岛屿来得晚。它原为明州定海县(今镇海)八乡之一。北宋熙宁六年(1073)，经宰相王安石提议，舟山重新建县，割鄞县富都、安期、蓬莱三乡置昌国县。五年以后，“益以定海县之金塘乡”。由于史料缺乏，不清楚其四址位置。但笔者十年前考证古诗《题回峰寺》作者时发现，昌国县问世前70年，舟山岛岑港已为定海县金塘乡所管辖。

《昌国州图志》称，《题回峰寺》为王安石任鄞县令时所作，回峰寺在岑港附近，属金三都。笔者考证发现，真正的作者是1001—1004年任定海县令的王曙。但舟山自唐废翁山县后属鄞县管辖，定海县令怎么会跨县来访？古代朝廷规定，官员任职期间不可擅离本地去外地。唐时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的最要好朋友元稹到绍兴任浙东观察使，两人只能靠寄诗交流友情。所以，答案只有一个：王曙到过的岑港是他的治下。这就意味着鄞县与定海县曾分治舟山岛。

古代设州、县、乡，多依地理情况，注重山河自然阻隔，且考虑治民方便。岛屿天然独立，那时人口不多，出现分治格局属于反常。笔者注意到，安期乡就没法参与分治舟山岛。从富都、安期两乡的吞名看，富都乡有沈家门、芦花、塘头等吞，显然一直管辖到舟山岛最东南；安期乡有桃花、马秦、梅岑等吞，似仅仅是其它小岛。而“大金塘”还要横插于蓬莱与富都两乡之间，甚至与蓬莱乡分治东、西岱山。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 航道之“藤”连出众多“瓜”

奥秘隐藏在它所包含的众多航道、航门里。从甬江口外金塘岛开始，由南向北，皆为明州进出商船重要航道要冲。这里东连峙头洋、马峙门；北沿册子水道、灰整洋，一路穿鱼山与西岱山航道，另一路过长白、秀山，北上岱山水道，还有一路走灌门过黄大洋，三路都是中国南北航运重要通道。这些航

道的周边几乎都为金塘乡的属地。航道好像长藤，不拘一格蔓延，连出“大金塘”众多小岛众多“瓜”。

这种模样布局明显有人为操作的背景。笔者以为，如此设置金塘乡，应是为了保障海上航行，深层次原因是与重视浙东、明州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有关。

金塘乡的“老家”——定海县，前身是宁波沿海的望海镇。唐元和十四年(819)，浙东观察使薛戎向朝廷上奏：“今当道望海镇，去明州七十余里，俯临大海与新罗、日本诸蕃接壤，请据勘文不隶属明州。”朝廷许之。薛戎是明州刺史的上司，他把望海镇从明州拿给自己直管，大约不是不信任明州刺史，而是看中海外贸易巨大红利，这与当年江南采访使齐瀚将鄞县升为明州的心态十分相似。薛戎相当重视航道通畅和安全。同时，长官意志让行政设置变形，可能就是以后金塘乡借航道之“藤”向北疯长的最大推力。

五代时，吴越王继承大唐传统，积极发展与新罗、日本等海外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望海镇被改为定海县。吴越王同样关注海上航行安全畅通，这从其分别向岱山水道两侧的翠萝寺和古泗州堂送以佛塔就可见一斑。另外，《资治通鉴》记载，五代时，福建地方政权只能通过海路向中原王朝进贡，需“过涇江，掠涇港，直东北度大洋，抵达登莱”。笔者以为，在涇港和对岸的岑港设立巡检司，由涇港主导一体管理航道安全，可能就始于此时。同样的事情可能也在东岱山和西岱山发生。

伴随着治安机构的登陆，接下来可能调整附近村吞的属地民事管理。到北宋建昌国县前，定海县比鄞县更具航道管理强势地位，这有助于金塘乡纳入更多重要水道附近村吞。大约就是依照这样的模式，金塘乡终于变得越来越大。但这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唐、五代、北宋，到南宋达到顶点，并延续到元朝。

南宋时期，推进“大金塘”兴起又有了新的动能——海防安全。担心北方敌人从海上南侵，一直是南宋政权挥之不去的噩梦。南宋政权刚成立，金兵南下，宋高宗逃到昌国，险遭不测。蒙古灭金以后，朝廷担心敌船驶入杭州湾攻击首都临安，不断采取加强海防措施。《宝庆四明志》等对此有许多记载。其中包括，设置沿海制置司，强化水军建设；调集浙江沿海民船数千只，前来定海等地戍守。“将台、温、明、越四郡民船屯泊于岱山、岑江、三姑山、烈港四处，仍发定海水军、岑江三姑巡检司土军能弓弩手者，敷滩逐处民船”；赴“神前、石同、三姑、宜山、马迹、关吞、海驴礁及海洋南北中间昼夜巡徽，三日一报枢密院及尚书省”。设置海上烽燧，从招宝山到壁下共十二铺，其中十一铺在舟山等。南宋一百多年，一直忙于强化海防自保，舟山是重中之重。笔者猜测，金塘乡作为通往明州和临安水道的重要之处，从优化海防资源出发，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展了它的辖地，比如宜山(今鱼山)、灌门等。

元朝覆灭，明朝兴起，不久舟山遭遇海禁，“去三乡，止存富都乡”。清康熙年间展复舟山，开始仍依原有四乡收取赋税，而“金塘等三乡版籍无存”，一片荒凉。